

内蒙古自治区城川镇天主教堂现状研究

阿拉坦宝力格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人类学系,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本论文根据笔者自 2003 年 12 月起两次赴城川镇, 面见现在的座堂主教马仲牧和部分教徒、教友们, 进行观察性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整理田野调查的笔记以及收集的相关文献资料,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 并论述牧民村落里落脚的天主教, 在其上百年的传播和地方化历史中, 对内蒙古地区文化的多样化以及对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共存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 信仰天主教的蒙古族; 多文化共存

中图分类号: B976.1

文献标识码: A

当谈到当代内蒙古自治区的时候, 人们首先会考虑到它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自治区域。在这里居住着以游牧为生活方式, 曾经信仰萨满教, 后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族人们。他们在上千年的历史中为适应这里的干旱地区生态环境, 维持着一种用家畜为媒介, 利用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自然资源, 维持生存的生活方式, 即传统的游牧生活。随着近几百年的开发, 这里也出现了农耕、工业等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民族自治区域里, 出现了除蒙古族以外还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生存的现实状况。他们今天不仅要和谐地共同生存, 将来也应和谐地共存下去。学术界在这全球化时代到来之时, 抱着忧虑的心态, 持续关注这个地域能否或如何地保持它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游牧生活方式或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特色等现实问题。笔者几次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Ordos hot)鄂托克前旗(Otog-uun emune hushuu)城川镇(Bor balgasu)糜地梁(Taraan shili)三队的天主教堂, 进行实地调研, 观察当代内蒙古地区不同宗教文化的共存问题。

过去对城川镇的天主教堂及传教方面有不少介绍性文献, 但尚未见到详细的学术性论述文章。尤其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 对其进行的研究还不曾多见。本调研报告根据笔者自 2003 年 12 月起两次赴城川镇, 面见现在的座堂主教马仲牧(蒙古名 Tegusbilig, 以下简称马主教)和部分教徒、教友们, 进行观察性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整理田野调查的笔记以及收集的相关文献资料,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 并论述牧民村落里落脚的天主, 在其上百年的传播和地方化历史中, 对内蒙古地区文化的多样化以及对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共存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

一、城川镇的天主教堂

(一) 天主教传到城川镇

据前人研究, 蒙古人早在十三世纪就有与基督教接触的历史。但是那个时期传来的基督教并没有被继承下来。我们今天考察的鄂尔多斯地区的天主教最早也就是 1700 年以后传来。这个时期天主教对蒙古的传播不是从鄂尔多斯开始。起初阶段他们看好的是察哈尔地区。1865 年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区, 其会祖南怀仁(Theeph Velist)等传教士到西湾子(今河北省境内), 开始了对内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但根据记载, 开始阶段的教徒大多数为外地移民, 而当地的蒙古人并不多^[1]。这里有几个原因可以考虑, 其一、基督教教徒的传统生活方式不太适合于蒙古人的游牧生活, 因为他们对定点定期的礼拜活动并不适应。其二、对蒙古人来说当时萨满教或佛教已经占据了他们的信仰

生活之全部，他们当时只信苍天或佛，而并不相信还有什么天主。另外天主教的传教或弥撒等都离不开文字书信，而当时以游牧为主的蒙古地区平民阶层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还有当时的传教士们为扩展势力，实行行善活动，这种行善活动无疑对当时为逃荒而来的外地贫困移民有着极大的经济生活方面的诱惑，也成为他们重要的一种精神寄托。

据多数有关文献记载和马主教的讲述，天主教在鄂尔多斯蒙古人中的传播，都和一个名叫萨木腾金巴（当地人称 Samtanjinba）的人有密切的关系。萨木腾金巴原为一名佛教徒。有些文献介绍他原来是一名喇嘛。其实当时蒙古族信仰的佛教也是藏传佛教。而且喇嘛在蒙古地区的佛教寺庙等传教地点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由他这样的喇嘛出身而后皈依天主教的人为基督教的传教士带路，这虽然是个偶然的巧合，但也许正因为他是个喇嘛出身的人，也会讲蒙古语，蒙古人可能更容易地相信他的劝说。

至于萨木腾金巴的民族出身，有些文献记载和城川教堂现任主教马仲牧提供的信息有所不同。根据马主教的陈述，一八七四年，萨木腾金巴是去往五台山的路上被一个传教士看见，传教士看他的穿戴破烂，行路艰苦，觉得很可怜，就问他要去哪里？萨木腾金巴答到要去找教理之源。传教士说自己也在传播教理，还告诉他天主教的原理。萨木腾金巴听后觉得传教士的解释比自己信仰的佛教解释还合乎逻辑。因此他觉得天主教是真教，即放弃佛教，皈依天主教徒（笔者的田野调查笔记）。这里很显然，马主教主张萨木腾金巴是被天主教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感动而皈依天主教。而根据金牡丹的《天主教在鄂托克旗》一文介绍，萨木腾金巴（原文记为沙木腾金巴）是在冯家场几户天主教民的影响下，又听到准格尔旗贝勒（官吏名称）扎那格尔迪领回天主教士的传闻后，对自己信仰的黄教产生了怀疑，为了搞清真相，他亲自动身到西湾子教堂，面会了天主教传教士们。传教士们热情款待了这位喇嘛，双方又阐述各自的宗教信仰，还展开了辩论，后在天主教的竭力拉拢诱导下，他背弃了黄教，皈依了天主教，当了比利时传教士得明玉和费尔林敦来鄂托克旗传教的向导。^[2]这里不但批评了萨木腾金巴的好奇和主动与天主教的接触的动机，还批评天主教传教士们的诱导行为。

根据古伯察（Regis—Evariste Huc, 1813—1860）的《鞑靼西藏旅行记》原著记载，事实上萨木腾金巴“既非汉人，又非鞑靼人和藏族人”。^[3]根据同书的注释或汉文译者的考证^[4]，萨木腾金巴（桑达钦巴 Samdadchiemba）是青海碾伯县的察罕胡尔人（Dchiahour），即土族人。起初他在北京当喇嘛，1842年冬季，“通过新入教者保禄（原为喇嘛）的渠道而熟悉了基督教理，他也被上帝的恩宠所打动，成了初学教理者，后来他又受洗并起了一个教名若望——巴普蒂斯特（Jean—Baptiste）”。正是他在年轻时，也就是1844—1846年间，当过法国人古伯察和秦神甫（Joseph Gabet, 1808—1853）横跨蒙古西藏的旅行向导。后来他又为比利时传教士得明玉和费尔林敦来鄂托克旗传教时充当了向导。据文献记载，传教士最初来到城川镇（蒙古语称为包日巴拉嘎苏 bor—balgasu）为1874年。就这样一个并非是普通平民，而是主持蒙古族传统宗教仪式的喇嘛，皈依了异教，并且还充当了向导的角色，把天主带到了以游牧为生活方式的蒙古人的村落里。

（二）城川镇的天主教传教活动

关于天主教在城川镇的传教活动，各种文献资料都有详细的介绍，因此在这里不再重复讲述。但在这里笔者根据田野调查的记录，根据当今坐堂主教马仲牧的讲述，对传教活动做一下补充性的介绍，这样首先可以避免有些由于反对外来宗教而产生的偏见介绍，其次也可以让人们从里外两方面全方位了解天主教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传播状况。

根据马仲牧的介绍，当年由萨木腾金巴向导的传教士们路径巴彦诺尔、银川后来到梁镇（今山西境内）附近的叫西树湾的地方搭了帐篷，暂时停留。这时遇见从河北逃荒来到此地的一帮难民，其中有几名难民为天主教徒，要求传教士们做弥撒。传教士答应他们的要求，次日早晨做弥撒，结果附近的很多人听到了传教士来到柳贵湾的消息，来了不少听弥撒的人，其中还有戴官帽子的人，而且他们戴着官帽子参加弥撒。传教士们好奇地问那些人，为何参加弥撒时不脱帽子，那些人回答

到，帽子是我们的皇上恩赐于我们的东西，为了表示对皇上的敬重，经常戴帽子参加礼拜活动。不难看出，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在开始阶段就遇到了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习惯，即不同文化的摩擦。

后来他们到苏坝海子盖了几间柳芭房子，开始了传教活动。据马主教讲，当时此地不种植树木，牧民也不盖砖瓦房屋，因此传教士们开始盖了几间柳芭房子，当作教堂。起初教民有 30 余户，后来从青海搬来 12 户移民，也入了天主教。后来传教士们在城川建了一座琉璃瓦教堂，到 1900 年时教民发展到 1000 余人，200 多户。做弥撒的地方也扩展到新寨子等几处。

当时，当地牧民生活比较贫穷，天主教传教士们也进行了不少慈善活动。比如有一名主教（闵玉清）回到了在国外的家乡，收集捐助，从外地买来 100 多头牛，分给当地牧民，当地牧民从内心佩服了闵主教。马主教把此次慈善活动说是太平天国以后的事情，但根据闵玉清当主教的时间来推理，他的此次慈善活动，其实是 1878 年的事情。

到 1900 年，鄂尔多斯地区也受到义和团的影响，开始了反对洋教（外国宗教势力）活动。有一个名叫刘明（音译）的人组织人马，准备攻击城川教堂。传教士们听到消息后到小桥畔教堂躲避。刘明的武装人马不仅掠夺了城川等地教民的财产，烧毁房屋，还烧毁了当时的琉璃瓦教堂。他们还围攻小桥畔，射杀了一名外国籍传教士。

义和团失败后，清政府与一些外国政府之间签订《辛丑条约》，开始了赔款谈判。根据金牡丹的《天主教在鄂托克旗》一文记载，1907 年，在宁条梁（今陕西境内）举行了赔款谈判，签订《宁条梁和约》。和约根据清政府和八国联军的规定，打死外国传教士赔命价白银 10000 两，打死一名中国教民赔命价白银 1000 两，损失一牦牛要赔偿白银 108 两，加上焚毁教堂、房屋、财产等，向当时的扎萨克（Zhazag）、鄂托克（Otog）、乌审（uushen）三旗共索赔白银 17 万两。其中鄂托克旗赔偿白银 84000 两，余款由扎萨克、乌审两个旗如数赔清。由于当时的鄂托克旗沿边汉族向来贫困，只征得白银 15000 两，其余部分，一是用牲畜廉价抵押，二是划拨土地，抵作赔款，即所谓的赔教地。当时为赔款抵押的土地大概有 2600 顷。^[5]

但是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这里的文献记载与马主教的口述也有些不同，这里抄写一段笔者的调查笔记。

根据马主教的讲述，当时经过谈判，由乌审旗赔款一万两，鄂托克旗赔款 9 万两。由于乌审旗有足够的白银筹备，立刻赔偿。由于鄂托克旗的白银筹备不足，从旗人征收款项。人们手头白银不多，一部分交纳现金，一部分以牲畜代交。当时还出现过负责征收款项的人贪污现金的事情，使得上交赔款出现短缺，而再次向旗人征收赔偿款项。此时旗人愤怒，组织群众大会，对旗政府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旗政府派 6 人团组，经过谈判，以土地当作赔款抵押。马主教认为，这种地不应叫洋地，而应称之为赔偿焚毁房屋财产的土地。根据当时的地方政府、民间组织“独贵龙”、教堂之间的书信往来^[6]，在土地归属权的问题上，当时的地方政府、民间组织“独贵龙”、教堂之间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从而教会和非教民之间也发生过土地纠纷。可以说当今的不同解释也是由当时的分歧所遗留而来。

当时传教士们利用上述赔偿金重新建立了教堂，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经常有土匪来扰乱人们的生活，赶走牧民的牛和马群。为防止土匪的袭击，教堂还建了大寨子，如果土匪（当地叫独立）来，牧民都跑道寨子里躲避。

传教士们还建立了医院，给人们治病，还给教民分拨土地，种植农作物等，进行过一系列行善活动。根据马主教的讲述，传教士们还利用骆驼，到银川运来土豆、高粱等粮食，救济贫困户。起初当地牧民不会种地，天主教教堂的传教士们教给牧民种地的方法，还教他们如何栽培柳树和葡萄树。原先这里的人们不知道西红柿，而传教士们开始在这里种植西红柿。还带来印刷的技术和机器等。他们还在镇上建立过一所 4 年制免征收学费的蒙古族小学。

传教活动一直进行到解放初期为止。根据文献记载,1946年8月5日收回城川教地,1953年“圣母圣心会”被驱逐出境。1980年后由当地蒙古族主教马仲牧的带动下恢复了天主教在城川镇地区的活动。但教务人员里没有外国神职人员。从主教到教会会长都是当地的蒙古族民众。

(三) 当代教堂基本概况

城川镇教堂最早建于1882年,但后来在反洋教活动中被焚毁。现在的城川镇所在地也有一座古教堂土墙遗址。此遗址大概为1906年重建的教堂遗址。重建的教堂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拆毁。1980年左右开始传教活动的马神甫(现任主教)曾想在镇所在地建立教堂,但由于种种原因,政府部门未批准,而另一处建立的教堂也在一年后倒塌。

现在的城川镇天主教堂坐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糜地梁三队。具体位置在离镇政府向北约十公里处,到了镇政府向西北方向去往鄂托克前旗政府所在地敖勒召其镇的公路3公里处,再直线向北走7公里既可到达天主教堂。此教堂始建于1988年。

教堂大院里建有一间大礼拜堂,三排住房。比较大的弥撒都在这个大礼拜堂里举行。当地人们把这里简称为“堂”。教堂周围是农田和树林。教堂在这里种植了20亩地,40亩草。还种植柳树、葡萄等。教堂还自酿葡萄酒。听马主教讲,酿酒的技术是由国外派来的传教士们教给他们的。

城川镇天主教堂自建立以来,由国外派来过若干外国神甫外还培养过三名蒙古族神甫。^[7]

姓名	任期	备注
魏林敦	1874-1876	第一次来城川的传教士之一
司福音	1876-1879	
方思洛	1879-1880	
罗庭梁	1880-1886	
袁万福	1886-1887	
闵玉清	1887-1889	病故于缸房营子天主教堂,给当地居民买来100多头牛
孟世昌	1890-1891	
雷齐华	1891-1897	
巴世英	1897-1898	主张建立纯蒙古教区,参加赔款谈判
南怀义	1898-1899	
巴世英	1901-1903	
葛永勉	1904-1910	曾任马主教的老师,建立过印书馆
党义仁	1910-1912	
田清波	1912-1925	著名蒙古学家
葛永勉	1925-1941	
贺歌南	1941-1943	建立蒙古族小学,开办医院

文怀德	1943-1946	
马元牧	1947-1949	当地蒙古人
石生玉	1947-1950	当地蒙古人，后还俗
马如龙	1949-1953	

表 1. 城川教堂历任座堂神甫名单（未包括现任主教和神甫，参照《鄂托克前旗志》）

这些神职人员对蒙古地区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对当地与外国、外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我们应注意到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之批评外，也应当看到他们对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所做的贡献。

2003 年 12 月，笔者进行调查时，教堂有一名主教，一名汉族神甫，修女三名，教会会长一人，学生三人，帮助教堂打杂活儿的有四人。但他们都不是长期固定的人员，2004 年 5 月，笔者再去教堂时，除主教、神甫、会长和老修女以外，其他人员有一些变化。帮助打杂活儿的变成两个人外，从巴盟来了两名汉族修女，还有附近的一名中年妇女帮助教堂的日常工作。

教堂为了顺利进行日常传教活动和祭祀活动，指定了详细的教堂规则，其内容如下：

“教堂弥撒规则：

为了做好天主教的弥撒祭祀活动，针对教堂的主教和修女指定如下规则：

- 一、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所有宗教事宜要根据政策执行。
- 二、主教和修女按时参加教堂弥撒。
- 三、教堂的全体师生经常深造天主教理，提高教学技术。
- 四、全体师生时常注意教堂的安全与卫生，防止外人的欺骗。
- 五、全体师生必须服从和完成教会安排的福利工作任务。
- 六、弥撒时间安排如下：1，夏会——清明前 10 天举行。2，复活节——阳历 4 月 17 日，根据具体情况可调整到前后几天之内。3，圣神降临——6 月 4 日前后。4，圣母升天——每年 8 月 5 日举行。5，圣诞节——每年 12 月 25 日举行。

此外还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每周和每月份的弥撒。

本规则自指定之日起实行。

特此通知

城川苏木天主教玛利亚教堂管理委员会

1998 年 11 月 12 日”。

很显然，当今教堂是通过这样的细则来把教堂以及他们的传教活动更加规范化。从此还可以看出，他们的传教活动积极响应，并且很重视当代政府部门的宗教政策，把服从党的领导和宗教政策当作了教堂日常行为规则的第一条。

二、主教马仲牧

（一）主教马仲牧的简历

主教马仲牧（马主教），蒙古名叫特古斯毕力格（Tegusbilig）。他的祖父以前在一座喇嘛庙里当和尚。当时的鄂托克旗王爷经常到梁镇（今陕西境内）赌钱。有一年夏天发洪水，路变得不好走，王爷叫来旗民为他修路。马主教的祖父也去修路。有一天正在工地修路时碰见王爷，王爷说他干活慢，用马鞭子抽打马主教的祖父。他祖父很生气，便罢工跑到城川入了天主教。当时他祖父 15 岁。当时西北地区的回民也造反，进入了伊克昭盟地区。其中的两个人来到珠和（地名）的一户拥有 1000 匹马的富人家，杀死了除两个小姑娘以外的全部成人，还叫两个小姑娘给他们煮肉吃。此时两个姑娘对他们恨之入骨，趁他们睡觉，把煮肉的热汤倒在他们头上后逃跑到城川。他们之间的一个为马主教的祖母。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西北回民起义军进入伊克昭盟地区为 1870 年左右的事情。[8]

马主教出生于 1919 年，幼年时期放过牛羊等牲畜，13 岁开始在当地建立的公校读书。在那里读了四年书后，到巴盟三盛公（磴口县境内）修道。在那里修道 6 年后到呼和浩特修道院。在呼和浩特修道院学了日语，哲学等课程，后又去了大同修学 4 年。1947 年回到三盛公，担任修道院的教师。1948 年被派遣到北京，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学习。1951 年回到家乡。1956 年开始在呼和浩特修道院任教。担任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课程的教学工作。1958 年被打成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接受劳动改造。原本为 8 年的劳动改造，但因为马主教在改造期间念经，劳改时间又延长了 3 年。1969 年被释放后回到家乡的水利站工作 10 年。1979 年被平反。1980 年开始传教活动。1983 年在包日汗哈图建立一座教堂，但 1984 年教堂倒塌。1988 建成现在的教堂，在此教堂主持传教活动持续到今天。他早在 1947 年被任命为神甫，1983 年被任命为主教。

（二）主教马仲牧的世界观

1. 对天和灵魂的看法

马主教认为，上帝为了拯救我们而派来他的儿子耶稣，耶稣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马主教对天（上帝）和天主的看法基本上来源于基督教的学说。他为了让人们理解他对上帝的看法，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讲述过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上帝不是空洞的理论，上帝是万物的缔造者。因为有了上帝才有这个世界的一切。他力图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上帝的存在。但他所讲的科学始终离不开一个上帝的第一个存在。用他的话来讲“不存在的东西不能创造自己，而有一个永久的存在把他创造出来，肯定有一个这种永恒的万物创造者存在，他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实际的万物之起源（实际上不存在就创造不出来实际的存在），我们称这个起源为天主（tengriinejin），我们的祖先称他为上帝（tengeri aabu），今天还是称他为上帝”。[9]

我和马主教谈到当地的教徒为何把天主教称为“蓝教”的时候他也谈到了这个上帝的问题。他认为蒙古人的上帝和天主教的上帝有关系。他认为蒙古人也信上帝，所谓的“蓝教”就和蒙古人的上帝有关系，因为我们蒙古人祭祀蓝天，所以叫蓝教。他说这个上帝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理论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在新约作品中，圣父、圣子、圣灵具有最紧密的关系”。[10]马主教也谈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组成了一体。马主教还说成吉思汗也信上帝，成吉思汗把自己说成上帝之子，所以蒙古人过去祭祀上帝。后来信仰黄教。他还想用这种三位一体的理论来解释佛教的一些教义。他举的例子是北京雍和宫的三尊佛像。实际上从佛教教义来讲，三尊佛像各代表前世、今世和来世三个世界，但马主教认为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体现。

马主教认为只有天主教是科学的宗教。他想用这种科学的宗教拯救蒙古人的灵魂。他不认为佛教是科学的宗教，因为他不信人会有来世。这样他便否定了佛教的为来世而行善的基本概念与信念。但他认为灵魂还是存在，所以他的宗教活动就是为了拯救人们的灵魂，由此来肯定了自己的信仰。谈话中他还用很尖锐的词语来批评佛教喇嘛。他还批评无神论。他认为当今社会的贪污犯罪与无神论有关系，因为无神论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是神。

很显然，马主教所讲的灵魂与蒙古人的传统观念，或蒙古人曾经信仰的萨满教所认识的灵魂有所差距。根据前人的研究，萨满教认为“萨满是象征性地媒介于人世间和他们所信之处的精灵世界

或灵魂世界的一种存在”。[11]萨满教认为灵魂是支配萨满的一种存在，而不是等着由谁来拯救的存在。

以上基本描绘出了马主教对上帝的观点。但我们在这里为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宗教对上帝的看法，也就是说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当代蒙古族社会里存在的不同世界观的共存问题，需要比较一下对上帝（天、tengri）的不同理解或解释。蒙古人的上天与他们的远古信仰萨满教有关系。蒙古人称上帝为腾格力（tengeri）。

有一名蒙古族学者在他的以 tengeri 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中使用 8 个条目概括和解释了蒙古语中 tengeri 的概念。[12]他提到了与萨满教或与佛教有关的概念。他也引用了一段波浪·嘉宾的“蒙古人认为上帝是一切的创造者”的话。但我们应该注意蒙古人的上帝和基督教所讲的万物创造者——上帝不是同一个存在的问题。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当今在蒙古国进行活动的萨满昭勒吉亚（Zholjiya）在她对新闻记者的一次谈话中把 tengri（上帝）和 ongod（支配者）联系起来，统称为 ongod-tengri [13]，即支配者——上帝，也就是说他们（ongod-tengri）是他（萨满）去另一个世界后见得到并给萨满指示的支配者们。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萨满所讲的“天”与天主教徒所讲的“天”拥有不同的特征和功能。也就是说马主教所讲的“天”和蒙古人的“天”并不是同一个存在。马主教认为，有一个被称为天或上帝的存在物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一切。而蒙古人的萨满认为天（tengri）在支配他们的活动，至于这个天是不是万物的创造者，没有太清楚分类概念。

2. 对民族文化的看法

马主教很想通过科学技术来维持和发扬民族文化。他认为科学的普及很有必要。而且还认为我们应该用民族的文字来普及科学。但是现在为普及科学遇到的难题为文字，他认为现在蒙古族所用的竖写文字不科学，所以记录自然科学的知识时有一定的不便之处。因此他还自己尝试过创作一种可以横着写的文字。字的基本形体与现在的内蒙古地区使用的文字形体相同。他还用这种文字写过笔记。

他认为，应该用科学知识振兴民族文化，蒙古人目前没有科学的宗教，蒙古人信封的佛教不科学，而天主教是科学的宗教。这里虽然暴露了他的宗教自我主义，但他的重视科学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他很担心现在的民族教育问题，因为现在城川镇米地梁嘎查已经撤消了使用蒙古文教学的小学。当地的蒙古族儿童如果想用蒙古语接受教育，必须到旗所在地上学。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家庭只好把孩子送到当地的汉族小学，接受汉语教育。

马主教用蒙古语抄写和翻译了很多有关天主教方面的书籍。他还翻译了圣经。

笔者入手的马主教编写或翻译的书籍目录有：

《天主是否存在》

《天主教要理问答》

《天主》

《世界不会永久存在》

《重要消息》

《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消息》

《旧约》

《弥撒圣歌》

《祷告书》

《教民请求》等。

上述书籍都以蒙古文书写。其中有些还应用了蒙古诗歌形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主教不但传教，还时常考虑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他用蒙古语书写的这些文献不是仅仅为传教服务，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蒙古语言文字的普及和传承方面也会发挥积极的影响。

三、当代教民

（一）教徒基本情况

根据鄂托克前旗民政局提供的数据，目前鄂托克前旗信天主教的教徒有 4491 人，蒙古族有 2091 人，从教徒的分布来看，城川镇有 2149 人，珠和苏木和傲勒召镇有 1742 人，其余的教徒分布在旗内其他乡和苏木（2005 年 5 月 1 日的数据）。城川镇的米地梁嘎查人口有 1064 人（现任大队长提供），其中蒙古族为 668 人。蒙古族都是教徒。现在的天主教教堂所在地米地梁三队有 44 户，170 个人口，其中有 6-7 户汉族，大概有 30-40 个汉族人口，其余全部为蒙古族人（前任队长提供）。三队的蒙古族人都是天主教徒。也有不少的汉族教徒。这里原先就是一个蒙古教民区。解放前就开始用蒙古语做弥撒。根据马主教的介绍，起初这个地方汉族人并不多，其大部分为解放初期来的移民。他们的有些人还和蒙古族姑娘结婚，随对方皈依天主教。今年 70 岁的前三队队长马德义（蒙古名为 Burinhesig）就是这样皈依了天主教。他们的老家在陕西榆林，两岁时候就来到此地。长大后因为娶了蒙古族姑娘，就入了天主教。除此之外，也有纯汉族教徒。他们大部分居住于镇上或南部的农业区。

（二）礼拜活动

根据前教会会长的介绍，每年的圣诞节，来教堂参加弥撒的人不少于 500 多人。来自城川镇的人有 300 多人，其余都来自于珠和（Juuha）苏木或乌审旗等地。每年举行的礼拜活动有复会、复活节、圣神降临、圣母升天、圣诞节等五次重大礼拜活动。其中 8 月 15 日的圣母升天节和 12 月 25 日的圣诞节时来参加弥撒的人最多。

蒙古族的教徒们一般不参加蒙古族传统的敖包祭祀活动。他们有时去参加敖包会，但不是去祭敖包，而是去看热闹而已。他们认为敖包祭祀活动是黄教，也就是喇嘛教的祭祀，他们称自己为蓝教教徒，因此不参加黄教教徒的祭祀活动。他们也不参加成吉思汗祭典活动。

他们对春节没有特别的要求，和其他人一样走访亲戚朋友家。

孩子到一周岁时也过周岁生日，而且有的家庭也聚集 80-100 多人的亲戚朋友来参加宴席。

根据 2003 年的圣诞节观察笔记，当地的圣诞弥撒如下：

12 月 24 日上午开始教徒们就断断续续地来访教堂，有的还从查干图陆盖（Chagaan tolgoi）苏木骑摩托车跑了 4 个小时来到这里。下午也来了很多人，他们中间有的来买耶稣像，有的来买挂有十字架的念珠，有的来找神甫谈话，有的还来买结婚纪念戒指。教堂的学徒们下午 4 点开始忙着装饰教堂，主教也开始用蒙古语写对联，教堂里充满了节日气氛。到下午 5-6 点的时，来的人也多起来了，我也找机会跟他们聊天。跟老会长的谈话就是在这时进行的。他给我讲述了牧民的生活，教民的习惯等很多事情。晚上 6:30 时开始由马主教给稀拉扎达盖（Shara jadagai）嘎查来的一对新婚夫妇主持订婚仪式。晚 8 点教堂里举行一次弥撒，由李神甫用（汉族、来自巴彦淖尔盟，原籍河北）汉语主持弥撒。参加这次弥撒的大概有 150 多人。人们进入教堂时都首先用手沾一下圣水，双手合掌，鞠躬耶稣，入座听取神甫的教导，还和大家一起念经。这圣水是晚 7 点的时候由李神甫在火上烧开的水壶里一边念经一边撒成盐而制成的圣水。弥撒结束后来教堂的人们有的还在教堂里念经，有的在外面自由活动，找亲朋好友聊天。到 10 点的时，教堂里还有一部分蒙古族教民念经。

11:40 时,教堂的大钟敲响,人们开始聚集到大教堂里,这时主教、神甫、修女、学徒们整理装着,做好进教堂的准备。整 12 点时,由主教带领,他们进入大教堂,举行一年一度最隆重的圣诞弥撒。这次圣诞弥撒大约持续 2 个时辰。弥撒由马主教用蒙古语主持。到凌晨 2 点弥撒结束后人们各自回家。次日上午 7:30,又开始了另一次弥撒,由李神甫主持弥撒。上午还遇见了几个昨天没有赶来,而今天赶来参加弥撒的教徒。上午 10 时,老修女嘎德日娜(Gadirina)还为一名年轻人主持了新入教仪式。12:20,时又举行一次弥撒,程序基本上和前几次一样,由马主教用蒙古语主持。1:30 时,弥撒结束后人们各散回家。忙碌两天后教堂又恢复了平常的宁静气氛。

(三) 生活习惯

笔者 2004 年 5 月初走访教堂附近的牧民家。根据了解他们每年到 4 月份就开始接羔,5 月份开始剪羊绒,6 月剪羊毛,8 月份忙于乳制品,9-10 月份忙于打草和为过冬季的筹备方面的劳动,11 月份冬季屠宰,12 月份接冬季羊羔等。如果是经营农业的话,2 月份开始犁地、加肥料,4 月份犁地,5 月份播种,6、7、8 月份灌溉,9 月份收割,10 月份加工入库,11 月份筹备燃料等。但不管是经营牧业或农业,每年到 12 月 25 日就到教堂参加圣诞节的弥撒。

风俗习惯方面让笔者注意到的有葬礼。天主教教徒的葬礼与其他蒙古人有一些不同之处。他们对死者举行特别的安葬仪式。教徒死后由主教给主持净化仪式,然后埋葬在指定的天主教教徒集中墓地,立墓碑,树十字架。现在的教堂西墙外还能看到神甫和三个修女的坟墓。

根据文献记载,这里的蒙古族人由于信仰天主教,取消了蒙古族的一些传统生活习惯。他们每星期到教堂念经。用饭前向主祈祷。他们庆祝圣诞节,而取消了腊月 24 日的祭火,还取消了一年一度的敖包祭祀和腊月 30 日晚祭祖先的习俗。改为清明节在祖先墓上洒圣水祈祷。[14]

这里的蒙古族牧民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方面和当地的其他蒙古族牧民有不同的特点,而在生活方式上看不到太大的区别。

(四) 经济收入

2003 年 12 月,笔者在城川教堂进行调查。根据当地居民 C 等人的讲述,这一地区经营半牧业和半农业生产,每户平均大约有 50-60 亩耕地,家畜头数 50-200 只,牛马 3-4 头。要说当前的生活困难主要是在牧场里不让放养家畜。因为夏天比较热,家畜不适应圈养,通年不得放养,冬天还可以圈养,但因为夏天不让放养,家畜吃不到青草,对家畜不好。自家的网围栏里也不能放养,如果发现放养就罚款,有的人家被罚了 1000-2000 元。有时把羊群都让他们(管理人员)赶走,不支付钱就不还给羊。他们对绿化也有自己的想法。根据他们讲,如过想绿化,有几种方法,可以分段绿化,但不让家畜放养就不行,家畜吃了干草就容易死。牧场里不让放养家畜,牧场的草干枯后得不到及时的清理,反而影响了青草的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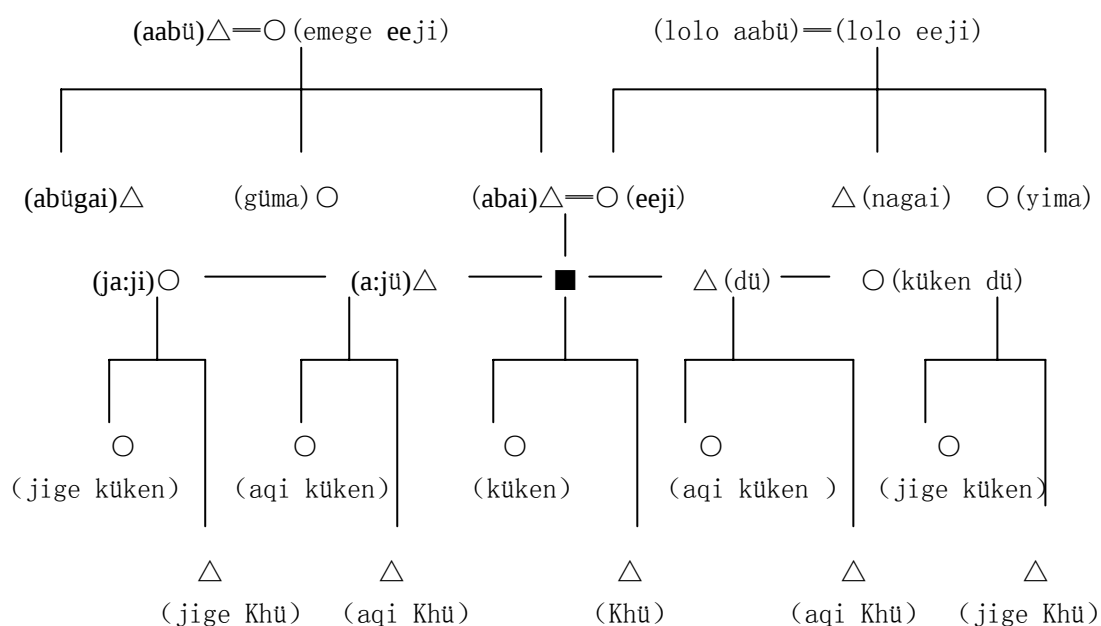
笔者为了进一步了解城川镇地区居民生活,2004 年 5 月 2 日再一次探访了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地区,走访了当地居民 E(男,26 岁)家。E 家 5 口人,有 17-18 亩耕地,10 多只羊,因“禁牧”放不了太多,就这么几只羊,有时也得夜里偷着放养。这里“禁牧”执行了两年。地里主要种植辣子、玉米、土豆、红萝卜、葵花等。一亩地玉米一年收 800 斤左右。全年收入大约 5-6 千元,开支后剩余 1-2 千元。自认为中等生活。

当天笔者同另外一个居民 F 的谈话中了解到,为治理沙漠,旗政府每年出资金种植红柳等树木。牧民自己也种植牧畜草等,种植牧畜草的目的是为了饲养家畜。F(男,35 岁)家有 3 口人,有 30 多只羊,品种为细毛羊,一年的羊毛收入大约是 1 千元左右。羊的头数多了就不让放养,只好卖,一只羊能卖 300 元左右。可以饲养猪,但投入太大,1 头大猪能卖到 1 千左右,但饲养费需要 500 元左右。比较起来还是放牧的投入少。但不让在牧场里放养,没有办法。地里种植玉米,辣子等,一年收入 1-2 千元。近两年这里的牧民都种植辣子,好的时候 1 亩地的收入能达到 3000 元。四月份

开始种植，8 月份收割。1 亩地种子投入 36 元，化肥 200-400 元。一家打一眼井花费 600-700 元。如买拖拉机就得花 1 万多元。F 还告诉我，听说辣子在一个地方只能种植 3-4 年，如果真是那样 3-4 年之后不知该如何。

根据笔者的观察，当地的人们生活并不富裕。这里的人们过去的生活也可能不那么富裕，尤其是天主教传来的时候，由于人们的生活贫困，很容易而且很愿意接受了伸出援助之手的天主的恩赐和天主教徒们的劝说，接二连三地皈依了天主教。正如《蒙古民族通史》一文记载：“有的蒙古人信奉天主教或耶稣教，也出于生活所迫，并非诚心信仰。”^[15]也就是说在天主教来到鄂尔多斯的初期阶段，这里的蒙古族民众信天主教的众多原因之一可能是经济方面的诱惑。因为我们所参考的很多文献也记载了传教士们当初通过种地、买牛等活动，如何援助当地人们经济生活的诸多举措。而且马主教和我的谈话中也提到过当时教会对他们家和当地的其他牧民给过很多经济援助。

（五）婚姻与亲属称谓



（图 1）城川镇蒙古族家庭亲属称谓

婚姻方面和同族结婚外，近年来也出现一些蒙古族和汉族等异族之间的婚姻。

订婚仪式在教堂里举行。由主教给主持订婚仪式。笔者在 2003 年 12 月参与观察教堂的圣诞节时也碰巧遇到了订婚仪式。新婚夫妇为当地的牧民，新郎已入教，但新娘还没有入教，所以今天马主教为他们同时主持了入教、订婚、结婚三个仪式。仪式在主教家里举行。主教首先领他们念经，然后把圣水涂在新娘的前额。然后让新娘、新郎互换戒指。戒指互换后新婚夫妇互相鞠躬敬礼，再对双方的父母以及在座的各位亲朋好友敬礼后订婚仪式便结束。整个过程大概花费了一个多小时。

听当地居民说，在教堂举行婚礼仪式后，在家里摆设宴席，邀请亲戚朋友，再举行结婚典礼。

看来他们一方面保留传统的蒙古族结婚仪式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欧洲人或更确切地讲天主教徒的婚俗习惯。而在亲属称谓和当地的牧民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们的亲属称谓除一些方言外与其他地方的蒙古族一样受到一定程度的汉语影响，但在基本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亲属关系以核心家庭为中心，再向夫妇双方展开。称谓名称方面对长辈女性的称呼受到了汉语的影响，而对晚辈的称呼方面几乎没有受到汉语的影响。

亲属称谓方面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受到欧洲人的习惯，但有些教徒或修女拥有两个名字，即本民族语——蒙古名字和例如 Margida 等外国语——教名。

四、不同宗教与多文化共存问题（结论）

城川镇位于内蒙古、陕西、宁夏三省区边界地段。这里位于蒙、汉、回三个民族文化交接点，从宗教方面来看，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儒教、佛教的交接点。这里还有蒙古人自身传统的无神论、萨满教、藏传佛教穿插并存。从地理环境方面来讲这里是中原地区与北方戈壁的交接点，从生活方式来讲这里是游牧生活方式与农耕生活方式的交接点，也是所谓的黄河文化区域与草原文化区域的交接点（图2）。

过去认为天主教在这些地区的进入是一种侵略，因此也被驱逐过。今天我们能否把它看成多种文化的共存呢？我们今天提倡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多文化共同生存的环境，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变的更为繁荣和谐的社会。为此今天在城川的天主教不但为地区文化的多样化中占据了应有的位置，还为我们的社会发展献出了应有的贡献。

正是由于天主教来到了这样错综复杂的多民族、多文化的交叉路口，天主教从传来的第一天起可能就遇到了当地的不同宗教势力的排外，或有可能遇到了一些文化方面的冲突。不过来到这里的天主教最后还是在这个多种文化的交接点上站住了脚。因为这里的天主教不是只保留自身的特征，他还为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扮演了很多地方化的角色。他们采取了以下的一系列活动来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保留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一）使用蒙汉双语做弥撒

这里的蒙古族教民比较多，因此重大的礼仪活动用蒙古语举行。笔者亲眼看到主教主持的婚礼，圣诞弥撒时都是用蒙古语念圣经。主教还亲笔书写了自己翻译的《圣经》蒙古文本。他还翻译了很多弥撒用的歌集、短文、书信等。

（二）利用蒙古歌曲的曲谱写或歌唱颂歌

这是天主教地方化的表现。他为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同当地的文化采取了妥协的办法。他们利用鄂尔多斯民歌曲调歌唱耶稣基督。2003年12月，一名83岁的老修女为笔者唱了一首歌唱耶稣基督的歌曲，而这首歌的曲调来自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盯浪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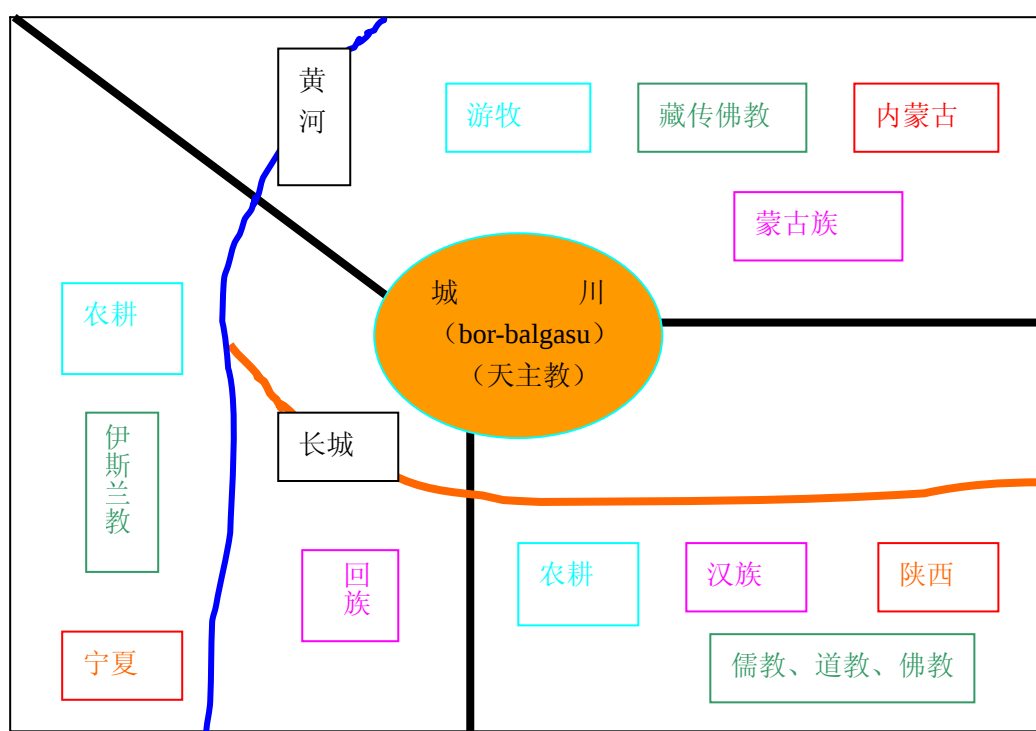
（三）历来推行的蒙古语传教策略

在内蒙古境内的其他教区汉人多，而蒙古人少，但在城川地区蒙古人多。其原因可能和他的历史有关系。来这里的传教士们一开始就推行了用蒙古语传教的策略。他们学习、研究蒙古语，还用蒙古语翻译基督教方面的书。他们还培养了蒙古族神甫和主教。外国籍的神甫里还出现过闻名世界的蒙古学学者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他们还为当地牧民办过用蒙古语教书的学校和印书馆等。

（四）慈善活动也顾虑各民族的利益

传教士们起初阶段也考虑这里的游牧民的生活，这一点可以用他们在传教初期的慈善活动中买牛一事来说明。他们推行种地的同时也为牧民从外地购买过牛，让牧民养殖。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天主教实现了在一个多文化交接点上的立足。在这样的文化交接点上降临的天主，怎样理解当今世人提倡的多文化共存，为多种文化的交流与共存起到如何的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值得我们去关注。



(图 2) 坐落在多文化交接点上的城川镇天主教堂

城川地区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它的地方化，或是它的地方特色无疑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和相互交流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和谐地共同生存。这里的关键在于彼此了解和承认对方的文化传统与特色。因为每一个民族和族群的文化之形成有它的生态环境、历史、传播途径等方面的特殊原因。这些不同的传统与特色在我们人类文化体系的多样化舞台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学术界人士应该详细研究这些生态、历史、传播方面的来龙去脉后对这些族群文化的特殊性加以解释。从而进一步探索人类社会结构形成以及人类文化体系形成之普遍规律。

参考文献

- [1] 王学明. 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史书店，1987 年.
- [2] 金牡丹. 天主教在鄂托克旗[M]. 汉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克昭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伊克昭盟文史资料》，第十辑，东胜，1999 年.
- [3] (法) 古伯察著，耿昇译. 鞑靼西藏旅行记[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13.
- [4] (法) 古伯察著，耿昇译. 鞑靼西藏旅行记[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1.
- [5] 金牡丹. 天主教在鄂托克旗[M]. 汉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克昭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伊克昭盟文史资料》，第十辑，东胜，1999 年.
- [6] 杨海英编. 国外刊行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史资料（汉文蒙古文对照）[M]. 呼和浩特: 内蒙人民出版社，2001. 1-74.
- [7] 《鄂托克前旗志》编纂委员会编. 鄂托克前旗志[M]. 呼和浩特: 内蒙人民出版社，1995. 161.

- [8] 刘金锁,等. 蒙古族通史[M]. 汉文,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236.
- [9] 马仲牧. 上帝是否存在[M]. 蒙古文, 手抄本.
- [10] (英) 麦格拉思著, 马树林、孙毅译. 基督教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03-210.
- [11] 米哈依·霍伯勒著, 村井翔译. 図説シャーマニズムの世界[M]. 日文, 东京: 青土社, 1998. 15.
- [12] 拉·胡日查巴特尔. 哈腾根十三家神祭祀[M]. 蒙古文,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0. 46-48.
- [13] (蒙古) 贺·满都胡巴亚尔. 萨满的生活[N]. 蒙古文, 生活报, 蒙古国乌兰巴托. 2000-06-18.
- [14] 《鄂托克前旗志》编纂委员会编. 鄂托克前旗志[M]. 呼和浩特: 内蒙人民出版社. 1995. 160.
- [15] 白拉都格其, 金海, 赛航. 蒙古民族通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785.

The Research into Present Situation of Catholic Church in the Town of Cheng-chuan in Inner Mongolia

Altanbulag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two interviews with the bishop Mazhongmu, some catholic believers and followers and the field work survey since December, 2003. By analyzing the notes of the field work and the collected documents objectively, the paper expounded the func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village, in the long course of its spread and localization, the catholic has its uniqu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Inner Mongolia.

Key words: the Mongol worshipping Catholic church; culture coexistence

收稿日期: 2005-11-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科研项目《草原游牧文明与蒙古族未来文明形态研究》(02JAZJD840009)

作者简介: 阿拉坦宝力格(1965—), 男, 蒙古族,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